

常住大陆台胞与在地城市的结构化逻辑

唐 桦^{1 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用吉登斯的行动与结构二重性理论重新审视和挖掘常住大陆台胞的行动资源,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新动力。本研究着重论证作为“行动者”的常住大陆台胞与作为“结构”的在地城市发展之间构成的一种相互影响的、处于变动之中的结构性转化关系。基本经验资料取自在厦门及苏州两地所做的田野研究。在台胞与城市的互动情境中,台胞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得到明显提升,最终表现为台胞城市身份的重塑和在地城市结构的重建,城市认同将两岸连接得更紧密,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 台胞; 结构; 行动; 城市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3-032-08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3.004

相比传统二元对立视角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吉登斯从“行动”与“结构”二重互动的角度提供了研究台胞与两岸关系的新视角。作为行动者的常住大陆台胞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为两岸关系和城市发展创造新的元素。常住大陆台胞指在大陆生活6个月以上(不包括短期交流、参观参访)移居至祖国大陆的台胞群体,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间的较为特殊的跨境迁移族群。^[1]本研究从逻辑上论证作为“行动者”的台胞与作为“结构”的在地城市的二重性及特点,挖掘台胞在在地城市发展中的能动性和行动资源,展现城市吸引台胞的规则和资源结构。除借助相关文献回顾之外,本文的经验材料是2017年7月在厦门和2018年8月在苏州进行的对15位常住大陆台胞的质性访谈。访谈内容部分主要以一项议题在访谈中是否达到咨询饱和度为判断标准。

一、台胞与在地城市的结构二重性

学界针对常住大陆台胞的研究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大陆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研究台胞的社会适应性与满意度,如对福建台商、昆山台商或“两岸族”等的研究,^[2]以及就业创业的区域意愿及其影响因素;^[3]一种是从台胞的意愿或需求出发,研究台胞来大陆之后认知认同的变化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等。^[4]前者“强结构而弱行动”,强调融入度和适应性就是偏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视角,后者“强行动而弱结构”,从台胞个人发展和需求出发则偏重解释学传统,^[5]都是从单一视角来研究台胞与两岸关系。单从“行动”或单从“结构”上去研究,首先缺乏对常住大陆台胞能动性的挖掘和理解;其次缺乏对于城市作为结构的正确理解,只看到现有的城市中的规则和制度对常住大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常住大陆台胞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与对策研究”(18BZZ115)

作者简介:唐 桦,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陆台胞的制约;最后,缺乏对于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论述,很容易走向对现有政策的简单梳理和建议。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实践观。^[7]根据结构化理论,结构是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行动者正是利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中再生产出结构。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对于行动者而言不是消极的存在,也不强制性地构成对行动者的限制。结构化理论强调结构的能动作用,因此,结构并不是由行动者消极地生产出来,而是结构本身积极地介入结构再生产的过程。^[8]

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用立足全局的结构化新思维来思考更大的问题。大陆的台商、台生、台干、台属、台青、台配等已有 200 多万,近年来更是出现台胞到祖国大陆旅游、探亲、就学、就业、创业、定居的高潮,两岸每年人员往来高达 900 多万人次,各种文化交流、青年交流等持续扩大。^[9]根据台湾《远见》杂志在 2018 年的调查,“31 条”公布之后,有四成一的台湾民众愿意赴大陆发展,其中又以 18-29 岁年龄层的意愿最高,达到 59.6%。^[10]两岸关系本身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随着常驻大陆台胞人数的增多,从强调台胞的社会融入到融合发展,就是一种结构的变化。城市是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行动空间,城市发展是常住台胞与在地民众在行动中创造的。这个结构又作为台胞在两岸关系中的社会情境,影响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这就是结构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既是行动的原因,又是行动的后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11]人们通过实践性行动不断创造着规则与资源,而这些规则与资源成为社会系统存在的重要内容,并经过时间的累积成为结构性的存在。人们在进行社会行动时不断产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社会制度,社会行动不断地卷入到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它包含了台胞在大陆就业创业是如何与在地民众在共同生活环境的条件下被结构化,如何调整他们在大陆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同时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因为台胞作为行动者而每时每刻以自己的实践在城市中和两岸关系中创造新的元素,逐步激发“融合发展”的实现。^[12]

“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13]大陆当前持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14]重视台胞对所居住城市在地事务的关切,着力塑造对所居城市的认同感,提高其在大陆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参与度,为他们在大陆求学、就业、旅行、婚姻等创造便利条件,就是基于台胞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各项需求对于规则和资源的不断调整。根据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逻辑,台胞与在地城市发展可做如下解读:(1)从作为行动者的台胞出发,城市中的台胞利用在地城市的规则和资源,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不断地重塑自身形象、身份和地位,转变成成为城市中的新居民;(2)从作为结构的城市发展出发,城市中的规则和资源内在地影响台胞的行动,作为行动者的台胞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城市发展的再生产。结构化逻辑表现为作为台胞的身份的重塑和作为结构的城市规则与资源的重构。“惠台 31 条”^[15]给予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同等待遇”,同时也代表着过去“独厚”台胞的“特殊优惠”将走入历史。赴大陆工作生活是台胞的一种理性策略,但意图不等于结果,工具理性出发的“实用主义过客”^[16]不代表后面不会因为城市的发展而留下来,也不代表无法影响其他台胞。只关注民调数据上的台胞认同,反而无法关注到常住大陆台胞群体因为人数众多产生的持续性后果,过于强调行动者的意图性,容易忽略行动的实践性。两岸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不仅是制度上且是观念上的深层转换,其实质是两岸关系中发挥重要交流功能的在地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基于台胞的切实需要而调整规则和资源,又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被常住台胞和在地民众共同改造,进而实现两岸融合发展。

二、作为行动者的常住大陆台胞

行动不是一些行为的组合,而是行动者作为主体经历过的经验绵延给予的话语层次上的关注

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涉,总是不断纳入共同在场的时空关联。参与两岸关系结构塑造的行动者众多,当然也包括短期交流的两岸民众。常住大陆台胞作为行动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看起来是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大陆,但是生活经验是连续流而不是分散的。大陆各地的共创空间、众创平台中的台胞很多是跟朋友或者整个设计团队一起过来创业,不管在过程中是加强偏见还是改变了偏见,都产生了新的空间和认知。“我来大陆见识到了很多很棒的创业平台和优秀的年轻人,这些平台提供了很多便利措施,台湾没有这种,苏州这边已经有很好的创业氛围,让我少走很多弯路。”(受访者 SZ09)“我还蛮喜欢众创空间这样的形式,都是年轻人非常好沟通,而且包括房租等政策非常优惠。”(受访者 XM01)台胞和在地城市的互动作为记忆痕迹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具体体现在城市发展的各种社会实践中,且内在于台胞的活动中,超出任何个体台胞的控制范围。由于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加上行动流中的结构性因素,在行动过程中往往存在大量“有意图行动的未预期后果”。吉登斯认为未预期的后果就是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赋予行动持续转换和建构能力,并在转换与建构的过程中完成结构化过程,实现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众多台胞的行动产生了一个累积的意外后果,这意外后果只能从一系列台胞的活动中而不是单个台胞的行动中去寻找根据,这意外后果还产生出一些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条件。“很多人愿意来,每次我回台湾,总是很多人问我华硕或是其他大的台资公司还收不收入,有没有机会从台湾调到大陆来。现在是很多人想来,却来不了大的台资公司。”(受访者 SZ05)“有很多新的一直过来,但我看他们都不是一个个人自己来的,都是以团队形式来的比较多,比如在台湾已经做出一点雏形了,然后整个团队搬到大陆来,赶上现在的创业机会,然后积极和政府联系。”(受访者 XM06)

结构行动二元对立的思维,让过往研究台胞的政策重点都放在如何放低准入门槛以及如何强化他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性上。研究表明,台胞来大陆后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封闭的内部社会支持网络,当地人对“两岸族”的同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并没有发生,反而是相互间的隔离和分化。^[17]若台胞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没有适合的保险来使他们获得生活上的支持时,他们会更加倚赖台胞专属的小群体社会网络,从而增加了自我交际的封闭性,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越发困难。结构行动二重性突出常住大陆台胞在两岸关系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树立行动者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城市确保台胞在大陆发展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台胞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全面参与大陆的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生活。^[18]“去程的时候我直接刷居住证进站,回程时通过自助取票机取了车票。”(受访者 XM04)“所谓给台商台胞同等待遇,就不意味着同等便利,我们台湾人也应该承担祖国发展的同等责任吧,来大陆要多学习,这里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都是这么教育我小孩的。”(受访者 XM03)台胞来大陆就业创业是有意图的,大部分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并非在最初就有意促进融合发展,可认知局限性带来的意外后果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融合发展的实现。虽然台胞未必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给两岸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行动的诸多后果是超出预期的,并且成为了后续行动的条件,但依然可以说他们成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构成要素,且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我来这里十几年了,没有什么社会融入的问题了。有问题公司会帮助解决。”(受访者 SZ03)常住大陆台胞与在地民众之间相互交流、互动、接纳和认同的结果,既是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也是政策层面的包容和接纳。城市成为两岸民众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基础上的兼收并蓄的新的命运共同体。^[19]“我早年到上海的整体感受:第一是觉得两岸饮食有差异。12年前的上海,饮食跟台湾差异很大,所以不习惯。第二是气候,上海太冷了。每次台办来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就说,太冷了受不了。第三人文环境的差异。这边人的谈吐比较凶悍,我很不习惯。但是这些差异,现在都渐渐减少了。”(受访者 SZ02)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不断壮大的台胞群体又可形成联动效应和“滚雪球效应”,有助于吸纳台湾更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西进大陆,有助于不断提升台胞扎根大陆发展的意愿,扩大台胞在大陆的规模,以深化两岸社会融合。^[20]

结构行动二重性理论视角下的台胞行动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生活体验”连续流,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台胞,都是一种新元素的生产者,是对他们在大陆生活就业创业进行过程的、现实的或预期的介入的连续流。“就其成员而言,须将社会的被创造与再创造过程证实为一个充满机能的行动过程,而不只是一系列的机械过程。”^[21]意识与行动的耦合促成了行动的动机激发、理性化与反思性监控的流动过程。行动流的概念试图表达行动的持续转换和建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动性,同时也是结构性因素与主体因素的合体。这样就拓展了台胞社会行动的外延,包括行动者、行动的场域、情景以及与之互动的其他行动者等。行动流是一种行动的结构化与再结构化过程,每一个台胞的行动又跟过去的台胞的行动处在一个连续体之中,他们的经验为未来的两岸关系提供启动新行动的手段。持续行动流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不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单个台胞各自赴大陆就业创业的行动。与此同时,行动本身总是超出主体自身的、非个体性的,表现为行动主体间关系的结构过程。这个反思性里面包含有台胞在大陆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产生的模糊地带的“共有知识”,其存在于行动者话语意识觉察不到的两个行动层次之间。^[22]“我的小孩虽然也常回台湾,包括我儿子回去当兵,在台湾企业实习,那边老板很想留他下来工作。他都坚决要回来上海。他说,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醉生梦死,根本不知道大陆现在发展得多快。”(受访者 SZ04)“我在台湾常呼吁大家来大陆,如果大陆有朋友要去台湾,我也都会回台湾接待。我本身比较喜欢热闹和交朋友。但是我在大陆生活很久了,所以,大陆这边朋友已经非常多了。”(受访者 SZ08)

如果不仅在对策层面思考台胞与在地城市的关系,而是将它们看作两岸关系中转换个体与结构关系的重大社会实践,当更具有理论研究价值。^[23]首先,台胞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于在地城市;其次,台胞是在在地城市中,建立与亲属、朋友的社会关系;最后,台胞是在在地城市中,接触国家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台胞在在地城市的行动已经构成多种类型的制度化实践,针对政府管理的评价、城市建设的要求、社区服务的感知等,因地制宜地连接起在地城市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的进程。“与台湾比,大陆的手续更注意细节,审批时间更长,分类也更加明确,总的来说更加复杂。但现在好多了,2016年之后简化了很多。”(受访者 SZ03)台胞的聚合、行为、观念也都直接影响到在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再造和管理体制的更新,深刻影响到台胞本身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重塑。在城市这个空间中,社会弱势群体、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共同在场,以城市认同为运转轴心建立相互的包容和认可。城市认同成为连接两岸关系的新的共有知识,比文化认同更能在台胞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除了城市可以给台胞的发展提供具体的发展空间和社会支持之外,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胞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更需要被重视。台胞对在地城市政策环境、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务的评价,除了影响他们对在大陆发展前景的预期,也反过来影响在地城市政府的改革和发展。台胞能动性的有限性则体现在:一方面受到城市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限制,一方面受到自身认知局限的制约。针对认知局限,大陆从政治社会化过程入手参与的可行性低,但可以从共有知识这个实践意识中的模糊地带着手,引导两岸融合发展的实现。共有知识对行动流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一种“如何”行动的能力,这种行动能力体现为行动流中的行动方法和技术,能够使行动者在意义的确定、方向的选择和有效性上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共有知识既是自身行动流顺利进行的润滑剂,也是不同主体间自然互动的润滑剂。在这一层意义上,它使行动不必时刻追逐反思,而是自然而然的流动、互动、改造与再建构。^[24]一旦台胞对自己在大陆的情境以及两岸关系的情境理解有变,行动就会改变。常住台胞能够直接感受大陆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环境,有可能促使他们思考大陆制度的合理性,从而缩小他们与本地居民在政治认知上的差异,减少隔阂感,提升参与当地社区、社会组织与活动的积极性。

三、增强台胞能动性的结构性因素

在地城市的规则和资源既可为台胞所利用,也可为台胞所重新构造。常住大陆台胞的能动性首先来自他们在在地城市就业创业的能力,而能力取决于自身在城市所拥有资源量的大小,以及行为规则是否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新资源的获得弥补所消耗资源的程度。规则的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台胞在行动过程中获取的资源量发生变化。^[25]相对于台湾越来越封闭和紧缩的交流环境,大陆惠台政策则越来越细腻和务实。“我真是受够了台湾政治人物每天各种胡闹的新闻,不做正事。大陆每天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台湾真是越来越落后了。”(受访者 SZ01)“惠台31条”出台后,各省市因地制宜,陆续出台配套实施办法,厦门60条、上海55条、昆山68条、宁波80条、深圳99条,等等。城市的规则为台胞在大陆就业创业的实践设定了基础,但城市的不良规则会阻碍台胞就业创业实践的开展。资源的动员赋予台胞实践权力,但不良的资源利用环境会影响台胞就业创业的效果。由于目前台胞聚集的几大城市(北京、上海、苏州、厦门、东莞等)的制度性和组织化的社会支持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台胞在大陆创业就业生活可动员的资源相对有限,两岸融合发展任重道远。台胞在城市中生活形成规模后,诸多个体台胞的行为因为持续的行动流产生的意外后果将催生在地城市政府的制度化行动,加快城市的发展、呼吁削弱功能性社会排斥,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更好地从结构性因素入手来增强台胞能动性的发挥,具体措施如下:

(1) 建设台胞分享型城市文化,活化城市公共资源。台胞聚集的几大城市可以先行尝试搭建台胞城市公共参与的平台,培育分享型城市文化,让台胞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一些决策中去,来决定在地城市的哪些公共服务应该得到优先发展。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参与的手段和途径,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移动App应用在台胞的城市需求表达方面大有可为。地方政府应该深化互联网技术的功能应用,并完善与市民参与相关的体制机制。重视合作性社交媒体的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公众分享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并惠及公众。台胞在城市虽然享有投资、税收等优厚条件,但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未能参与意见,日后可就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个性化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鼓励台胞参与当地建设,比如积极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的更新计划。鼓励台胞多参与组织建设与协同发展,通过提供各种鼓励本地人口与台胞通婚的组织化方式来增加社会资本。地方政府不但要提供多种公共参与的渠道,还应推出更多的针对台胞的教育项目,定期举办“分享周”“分享峰会”活动,营造“自我组织、共同计划、共同建设、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现实情境,邀请两岸青年尤其是台湾青年参与城市公共价值的创造。

(2) 合理配置城市就业及租房格局,调整市场配置与成本分担。为鼓励支持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国台办2016年出台规定,指导各地从创业启动资金、融资、办公场所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26]奖助补贴的直接实施会吸引部分台胞过来,但也容易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针对没有大陆户籍却想在大陆创业就业的台胞,因为政策排斥造成了就业选择的被动性和过滤性,使他们被限制了获得经济资本的路径,不能灵活拓展其他路径。提供人力资本转化孵化器,使台胞中独特的人力资本在当地受到重视并得以发挥。要集中几个重点二线城市,激发台商企业聚集区的发展活力,凭借产业转移和升级引导台胞合理有序地流入,通过规划财政预算和提供政策保障降低台胞在当地的交易成本,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和以市场为主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27]开放住房公积金和配套租房等举措,提高台胞在在地城市中改善居住品质的能力,帮助其打破居住隔离,完成居住融合。

(3) 建立台胞专项智慧型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交易成本。2019年2月27日,吉祥物为熊猫“融融”的“31条App”上线。该App具有两岸信息集合、权威信息发布和小区问答互动三大版块,内容为介绍对台政策、创业台青故事、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详细列出大陆各省市乃至省以下的县

市所推出的对台举措,并以视频、图表、照片和文字等多元方式呈现。台胞密集的典型城市,加强整合以城市为主的政策发布平台,比如服务台胞为主的微信公众号、网络一站式台胞服务窗口等,内容要侧重政策发布、咨询及相关事项的办理服务。通过政务云建设将政府数据、公众参与工具、社交媒体和政务服务进行联动,将整个业务流程实现跨部门、跨层级共享。除了政策宣传和信息服务,终端服务建设也要跟上。比如卡式台胞证由于必须使用专用取票机,且机器仅在个别站点少量配备,导致台湾同胞大多数时候仍然要到窗口排队取票,实际上并未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反而容易引发失望情绪。加快公共服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医疗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等,需要专门增设台湾青年板块,同时配合专题信息化培训,争取大大降低信息交易成本。

(4) 落实台湾健保与大陆医保的沟通对接机制,强化“同等待遇”。“惠台31条”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需要我们落实与强化,不断提升台胞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共建两岸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没有医疗保险的台胞,在大陆就医面临可就诊医院少、医疗费用高等问题,更无法与他们在台湾的健保实现衔接结算。而一些享有在地城市(比如厦门、苏州)医疗保险的台胞,因为两岸医疗体系的区隔,无法实现病历查询、对接等服务。大多数台胞常常往返于厦台两地,一些台胞更习惯于在台湾就医,他们在台湾享有的健保惠利往往更大,因此对于台胞而言更为迫切的,应是落实台湾健保与大陆医保的沟通对接机制,尤其是二者之间的报销结算。此外,增加定点医院或定点窗口,建立两岸的医疗信息平台,实现两地医疗机构的互认以及相关信息的共享也十分重要。除因病就医外,使台胞享受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是落实居民待遇的重要部分。

四、总 结

两岸融合发展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推进城市交流和增进城市认同是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共同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28]在地城市作为结构需要完善吸引台胞的规则、资源,以及获取途径,优化适合台胞发展的环境,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胞也应主动、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城市资源,不断争取和完善符合自身利益的城市规则和资源的调整,在日常情境中增加对在地城市及两岸关系的理解,同时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将在地城市再生产和再结构化。常住大陆台胞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大陆经济发展中的红利,产生新的集体记忆和共同利益,从城市认同拓展到文化和民族认同,从“我”发展成“我们”,最终促成从“他者”到“我群”的转变,为两岸完全统一奠定坚实基础。

附录:

表 1 苏州访谈对象一览表

序号	事业背景	性别	在陆年数	访谈时间
SZ01	制造业	男	10	2018 年 8 月 13 日
SZ02	金融业	男	6	2018 年 8 月 13 日
SZ03	科技业	男	11	2018 年 8 月 14 日
SZ04	科技业	女	10	2018 年 8 月 14 日
SZ05	制造业	男	7	2018 年 8 月 15 日

续表

序号	事业背景	性别	在陆年数	访谈时间
SZ06	金融业	女	3	2018年8月15日
SZ07	自由业	男	8	2018年8月15日
SZ08	科技业	男	10	2018年8月16日
SZ09	自由业	女	6	2018年8月16日

表2 厦门访谈对象一览表

序号	事业背景	性别	在陆年数	访谈时间
XM01	自由业	男	8	2017年7月5日
XM02	餐饮业	女	10	2017年7月5日
XM03	餐饮业	男	7	2017年7月5日
XM04	医疗业	男	10	2017年7月6日
XM05	金融业	女	4	2017年7月6日
XM06	金融业	男	8	2017年7月6日

注释:

- [1] 严志兰《大陆台商社会适应的共性与差异性——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 [2] 请参阅王茹《台湾“两岸族”的现状、心态与社会融入情况》，《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舒瑶《“台太”的社会融入——基于上海的个案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严志兰《大陆台商社会适应的共性与差异性——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张宝蓉、王贞威《在大陆的台湾青年社会适应性与满意度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5期。
- [3] 请参阅刘澈元《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差异性政策诉求及原因探析——基于对台湾4所高校103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现代台湾研究》2016年第6期；苏美祥《台湾青年来闽创业的背景、基础与推进路径》，《发展研究》2017年第2期。
- [4] 郭艳《大陆台胞的认同变迁：一种基于理论的探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严志兰《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以大陆台商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单玉丽《台湾青年面临的就业问题以及来大陆创业就业的态势分析》，《现代台湾研究》2016年第6期；刘澈元、刘方舟、张晋山《期望与认知的错位：台湾青年世代的“大陆印象”研究——基于对台湾四所高校103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2期。
- [5] 李红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哲学动态》2004年第11期。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
- [7] [11][13][21][2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0页，第43页，第52页，第57页，第64页。
- [8] 贺建军《社会企业与农村社区化——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视角》，《人文杂志》2016年第7期。
- [9] 谢郁《践行习近平对台思想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十八大以来大陆对台工作成效评析》，《中国评论》(香港)2017年4月。
- [10] 林瑞华《改革开放40年后，台商下一步往哪走？》，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818?adchannelID=&full=y&archive>，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9日。
- [12] 唐桦《制度、利益与观念：十九大报告与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理论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5期。
- [14] 《俞正声出席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月21日。
- [15] 2018年2月，国台办出台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31条”或“31条”，希

- 望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就业、实习。
- [16] 陈超、蔡一村、张遂新 《“实用主义的过客”: 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建构与现状评估》,《台湾研究集刊》2018 年第 1 期。
- [17] 王茹 《台湾“两岸族”的现状、心态与社会融入情况》,《台湾研究集刊》2007 年第 3 期。
- [18] 嘎日达、黄匡时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理论视野》2008 年第 1 期。
- [19] 杨菊华 《论社会融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
- [20] 谢楠 《大陆“新台商群体”的基本特征与未来发展路径探析》,《台海研究》2017 年第 4 期。
- [23] 吴予敏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二重性和社会行动者——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视角》,《学术研究》2016 年第 10 期。
- [24] 赵云亭 《行动流: 可能及其可为的逻辑思考——吉登斯行动理论的研究与启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 年第 6 期。
- [25] 规则包含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号,而资源则包含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资源不只是对某种现状的描述,而是一种能力。
- [26] 截至 2016 年底,大陆 53 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共入驻或服务台资企业近 1 200 家,吸引超过 6 000 名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17 000 多名台湾青年参加基地或示范点组织的各类实习就业、创业创新交流活动。
- [27] 徐至寒、金太军、徐枫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 年第 1 期。
- [28] 《国台办: 望加强两岸城市交流合作 共同增进两岸民众福祉》,人民网时政频道, http://sh.qq.com/pc/9b2765f02a7407c71?cota=1&sign=360_e39369d1&refer_scene=so_54, 访问时间: 2018 年 12 月 1 日。

(责任编辑: 张文生)

The Structural Logic between Taiwan Compatriots Living in the Mainland and the Cities Where They Live

Tang Hua

Abstract: By using Giddens' action and the structural duality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 re-examin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resources of Taiwan compatriots living in the mainland, and provides new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integ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influenced and chang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compatriots living in the mainland who act as "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itu cities as "structures". The basic experience data is derived from the field studies conducted in Xiamen and Suzhou. In the interactiv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aiwan compatriots and the cities where they liv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autonomy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patrio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ultimately manifests the reshaping of the Taiwanese city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situ urban structure. Meanwhile, the urban identity has connected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closer,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s integration.

Key Words: Taiwan compatriots, structure, action, city